

中国自传文学传统的形成

——先秦至魏晋自传中文人的自我呈现

王莹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 先秦至魏晋是中国自传文学传统的形成期,正是这一阶段自传文学的发生发展,才将自传塑造成为文人自我对于个体命运和文化选择的言说方式、集体无意识的时代氛围和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三者交相辉映,融汇文人自我呈现、历史史实和民族思维方式的复合型文本。自传本身作为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描述的特质与传主特异的人生经历相黏合,加之自传书写目的的不一而足,形成了自传摇曳多姿、魅力无穷的文化景观。将中国自传文学的发展放置于先秦至魏晋这一阶段来考察,尤其能深刻地探知中国自传文学传统的形成,文人自我呈现方式的流变,从而看到中国自传文学的原初形态和渐进式的发展脉络,及日后蔚为大观的文化成因。

[关键词] 自传文学 传统; 先秦; 魏晋; 文人; 自我呈现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5)03-0118-07

自传文学作为文学世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不仅蕴含着一个民族自我表达的言说方式和时代背景的映射,同时更是深具史料价值的珍贵文本。个体命运在历史洪流裹挟下的无常遭际,个人化的生命体验隐喻着的时代集体无意识的感受、氛围,浮沉起落,升迁贬谪,喜怒哀乐,皆在自传中得以触手可及的真实呈现,这些带着先人生命体温和脉搏跳动的篇章,令后人在倚靠文字勾勒出其人生平原貌和精神追求的同时,也对人物背后流动的巨幕背景有了窥一斑而知全貌的间接认知。

中国的自传文学传统源远流长,且甫一登场,就筑起令后世仰首观止、顶礼膜拜的奇峰,此后经由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大家的开拓与发掘,由是踵声增华,渐形成中国自传文学品貌多样,风格迥异,众体皆备,瑰丽如画的传统。

中国的自传文学传统的形成,主要是在公元前先秦至魏晋这段时期,唐以后进入辉煌期,因此,将中国的自传文学放置于先秦至魏晋这一时间区间来审视和考察,尤其能深刻地感知中国自传文学传统的形成过程和文人自我呈现方式多元化的渐进式发展历程。

一 “自传”一词在中国的首创及其在世界“自传”语汇中的时间坐标

与西欧所用的 autobiography 一词语义完全吻合的中文的“自传”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 800 年左右的中国的中唐时期——陆羽(公元 733?—公元 804?)的《陆文学自传》一文中,这一时期也是中国自传文学发展的一个新纪元。Robert Folkenfic 在他所编的 The Culture of Autobiography^[1](《自传文化》)一书中曾对“autobiography”一词从语源学角度做了深入地考证,从而得出了以下结论:1786 年,“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这一以“autobiography”为词根的形容词形式最早出现,“autobiography”及其同义词“self-biography”在 18 世纪后半叶在英国、德国偶得一见,法国则一直到 19 世纪三十年代才开始使用。而据日本学者中川久定的考证^[2],以卢梭的《忏悔录》为先导的欧洲近代自传,形成于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前半叶,和“autobiography”一词的出现时间,大致吻合。

由此可知,中国的“自传”一词的出现,较之西欧,早于其千年。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上,自传文学在中国的诞生却远远早于“自传”这一标志性语汇的出现。中国的自传在最初出现时,是以置于书籍

[收稿日期] 2015-02-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唐宋诗词中的生态审美与中国文化精神”资助(编号:13CZW039);人社部留学人员科技活动择优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王莹(1980-),女,河南郑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创新工程执行研究员。

之末的序中登场的,称为“自序”、“自叙”或“自述”,目前历史上有记载的当推司马相如的《自叙》,惜其早已亡佚,所幸文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因《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采录得以流传至今,但其作为自传的存在显然已随历史湮灭。但这可视为自传入史的重要例证。

故现存的已有公论的中国自传文学滥觞当推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太史公自序》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一篇。从这以后,‘自序’就作为书籍的序言形式,世代相传。”^{[3]15}

那么,中国自传文学从问世之日起就为其传统奠下了怎样的底色和基调呢?郭沫若在其作于1928年的《我的童年》的《前言》中的一段话或可为此做以明晰的注脚:“我不是想学 Augustine(奥古斯丁)和 Rousseau(卢梭)要表述甚么忏悔,我也不是想学 Goethe(歌德)和 Tolstoy(托尔斯泰)要描写甚么天才。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说有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4]郭沫若的概括中透露出西欧自传两种广为人知的主要类型:自我忏悔剖白型和卓越天才展示型。而正如郭沫若所言,在中国的自传文学传统中,则多是在描述自我生命轨迹的同时,凸显人物在历史浮沉、命运升降中的精神追求和灵魂坚守。

二 中国自传文学的发轫期——两汉

现存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自传——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中有关自我的叙述就如上文所言。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置于他所著的举世闻名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130卷之末,是全书的序言。作为史学世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是西汉(前202年-9年)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谈是当时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著有《论六家要旨》一文,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秦至汉初以来阴阳、儒、墨、法、名、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并对道家思想进行了高度肯定。该文是对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总结。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东巡至泰山,并在山上举行祭祀天地的典礼,即所谓“封禅”大典。司马谈当时因病留在洛阳,未能从行,深感遗憾,抑郁愤恨而死。他所要论著历史的理想和计划,便留给儿子司马迁去实现。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去世,天汉二年(前99年),司马迁承袭父职,任太史令,同时也继承父亲遗志(司马谈临终曾对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5]3295}),是年十一月,出战匈奴的大将李陵战败被匈奴俘虏,司

马迁因替李陵辩护,令皇帝认为他是在诋毁这次讨伐的主力李广利,而李广利恰是皇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因而司马迁被捕入狱,判死刑。天汉三年(前98年),李陵被灭族。司马迁为著作《史记》而忍辱苟活,自请宫刑。依据当时律法,这是他唯一可以保全性命完成著述《史记》之宏大理想的屈辱选择。汉武帝天汉四年(前97年)被赦出狱,任中书令。《汉书·司马迁传》:“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6]发愤著《史记》,这便是历史上举世著名的司马迁“发愤著书”这一典故的由来。司马迁在他的《报任安书》、《悲士不遇赋》等作品中对于悲惨的人生经历都有所描述,可作为《太史公自序》的参照读本。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史记》完成。

《太史公自序》五分之四的篇幅,都是围绕《史记》谋篇布局的思想和具体内容展开,只有起始的五分之一的内容,是具有自传色彩的部分,然而正是这部分内容,奠定了《太史公自序》作为中国现存文献中自传文学滥觞的历史地位。

《太史公自序》开篇即追溯司马氏之始祖,及至其父司马谈,引其“六家要旨”,之后才谈到自己的诞生、求学、游历、仕宦、致罪、著书。这样的叙述顺序,为以后的自传开创了传统,规界出后世自传的基本要素——家世背景、出生时地、求学经历、仕宦之途。

作为自传的《太史公自序》,并非简单的司马迁个人人生经历的记载,而是包含了广袤深邃的历史文化元素的精华文本,因之反映了自传作为一种文学类型产生的文化心理动因和社会历史承载。

第一,文人士大夫恪守本职,传承历史,沿袭家世,光宗耀祖的文化使命感。众所周知,《史记》不仅是司马迁“发愤著书”的产物,更是他子承父命的产物,汉代史官作为文人士大夫的文化使命感因此可见一斑。《太史公自序》中的话很好地呈现了这一思想: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

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5]3295}

第二,先秦儒家哲学的深刻影响植根于其思想中,产生了的深重苦难是凤凰涅槃的命运先兆的文化心理暗示。《太史公自序》中有一段重要的叙述: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於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5]3300}。

引文中的句式和叙述模式,与《孟子·告子下》中著名的论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从句式到语言、思想逻辑上如出一辙。而综观司马迁在承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下“发愤著书”的彪炳千秋的巨大成就,足可为孟子名言之明证。

第三,先秦“三不朽”思想在其脑中打下的深刻烙印。“三不朽”的说法最早见于春秋时期鲁国左丘明的《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前549年)和《国语·晋语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疏:“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7]这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命题。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即树立高尚的道德;“立功”,即为国为民建立功绩;“立言”,即著述具有真知灼见的言论。此三者是可以永垂不朽,流芳百世的。司马迁在写给好友挚峻的书信《与挚峻书》中引用了这一说法,尽管对于立言和立功的顺序有所调整,劝好友放弃隐居,积极致仕。从日后司马迁遭遇深重苦难也要完成《史记》的著述来看,对于“三不朽”的人生价值观的尊崇,贯穿了其一生。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在谈到《史记》的写作时写道:“仆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改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8]其以立言方式追求不朽的动机,昭然若揭。

第四,自我个体生命特异性的自觉认知。这是中国自传传统的重要特征,川合康三先生在其著作中有如此论断:“如果说西欧的自传是以一个人在回顾个人历史时发现自己与过去之我有异为契机的

话,那么中国的自传则是以发现自己与人类社会大多数人的不同为基点。就司马迁而言,正是公众社会对自己的排斥,才促成了他对自己异于众人的觉醒。”^{[3]19}而这一心理机制的产生,又并非单纯缘于司马迁本人的人生经历,而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源流,其根源是战国时屈原(前340年—前278年)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9],在被周围世界的排斥、否定和孤立中,从而看到自我的独特价值所在,进而寻求可能的方式令自我的价值得以实现。结合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屈原的极力推崇,可见其将屈原的人格追求引为同调的价值取向。对于屈原的推崇,并非司马迁的个人行为,在先秦后,这成为文人士大夫的一种集体认知。因而可以说,对自我个体生命特异性的自觉认知成为催生自传形成的关键因素,并由此成为中国自传文学传统的主要特征,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而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作为现存的中国自传文学诞生的标志性文本,成为后世中国自传文学的圭臬。《史记》的宏大成就,司马迁惊世骇俗的人生经历,极具感染力的撼人笔触,使《太史公自序》成为自传文学不可逾越的高峰,后世的中国自传文学皆无法绕开其影响,并由此开创了借书籍序言书写自传的传统。

汉代是自传文学发展的发轫期,但这个发轫期已呈现出蓬勃的发展势头。司马迁之后,扬雄、王充、班固等汉代大家均有自传问世,对于丰富和发展自传这一文学类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且都文采斐然。他们的自传,亦承司马迁之传,置于其著作之中,东汉班固的《汉书》的最后卷100写有《叙传》上下两篇,但其自传除了具备前文提到的自传的基本要素——家世背景、出生时地、求学经历、仕宦之途等特征的简单描述外,班固将笔墨大量放在了对于显赫的班氏家族的记述,同时还加入了自己作品的转载。与《太史公自序》不同的是,对于自身曾追随外戚窦宪,后因窦宪失势身陷囹圄的人生起落,却未涉及,这种对私人化人生经历的刻意回避,开启了新的史书撰写传统,“史书的自序,就是这样从说明写作的原委,逐渐变为撰写者家族的传记。”^{[3]21}与司马迁同样作为史官世家出身的班固,对于私人化人生经验的省略,家族历史叙述的强化,除了昭示着从西汉到东汉,从司马迁到班固,从《太史公自序》到《汉书·叙传》,史书撰写的新方向——个人以家族的方式进入历史的史书序言书写模式的建立,同时还隐喻着文学发展的新变,即史书的官方化色彩日渐浓厚的情况下,个人以家族的方式进入历史的可

能也日渐变为奢谈(唐代史书改为官修,序中不再出现家族介绍),个人的生命历程的叙述和记载将越来越无处容身,为了寻找其存在形式,必然要挣脱作为史书附庸的命运,而成为独立的文学类型存在。

作为史书的一部分存在的自传的诞生,对于史学本身的发展,还产生了奇特的影响。自司马迁将司马相如的自传多处录入其《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开始,在中国自传发展史上,就开启了一个新的史书撰写传统,即自传直接入史的传统。司马相如的《自叙》虽散佚,但其全貌却在《史记》中基本得以保留。自传进入正史,得以成为史实的一部分而千古流传,是自传的历史地位得到官方化的认可和进入主流文化视野的突出体现。班固沿袭了这一传统,《汉书·扬雄传》是班固《汉书》中的经典篇章,文中记载了扬雄一生的学术活动及文学创作,交代了扬雄的人生及艺术旨趣,对其成就和价值给予高度评价,由此使人看到扬雄一生文化活动的各个方面。全文大部分内容是直录扬雄的自传,体现了班固对于扬雄的自我评价完全赞同,以及对于其自传作为正史的资格和价值的高度认可。而与班固生活在同一时代的王充,其《论衡》中的自纪篇,也是汉代自传的突出代表,其中记述的内容,被范曄《后汉书·王充传》多处采用,同样是自传入史的杰出代表。

在司马迁之后,汉代的自传在内容和风格上一直在进行着新的探索 and 开发。如王充和曹操的自传作品。在《论衡》的自纪篇中,王充用如下的句子描述自己的状态:“见污伤不肯自明,位不进亦不怀恨。贫无一亩庇身,志佚于王公;贱无斗石之秩,意若食万钟。得官不欣,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10]这与颜回安贫乐道的精神状态极为类似,与司马相如的“发愤著书”相比,王充的“不争”中隐含着一种对世俗规则的蔑视。魏晋之后的自传中塑造的与世俗规则格格不入的人物,似与之一脉相承。而且在叙述形式上,王充也有其创新价值。其自传中不断以问答体来阐明自己为人处世的思想,这种自传书写形式上的创新,虽与其自传作为《论衡》一书的一部分,因而也带有浓烈的说理性质密切相关,但这一形式的发掘,为后世自传的书写奠定了形式不拘一格,重视自我辨明的传统。川合康三先生认为:“较之自我审视,更注重自我辨明的传统,不仅是王充,在以后的中国文学自传中也延绵不绝,成为与西欧近代自传迥异的一大特色。”^{[3]29}

在东汉末的建安十五年(210年),魏国政权的

缔造者曹操也加入了自传书写的序列。《让县自明本志令》又名《述志令》,是反映曹操思想和经历的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重要文章,写于210年(建安十五年),曹操五十六岁的时候。尽管作为自传,《让县自明本志令》并非如之前的那些自传着重于对自我总体化的概括,而是对某一重要人生片段的纪录和总结,同时也表达和昭告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将自我标榜为汉室忠臣,以打消当时天下人普遍对其的猜忌,隐藏其真实的政治野心。在对当时的历史史实的记载上,也极具史料价值。因而,曹操的这一自传,是一篇内涵繁复、真假参半的迥异于前代的自传作品。他完成统一北方大业后,政权逐渐巩固,继而想统一全国;但是孙权、刘备两大军事势力仍然是他的巨大威胁。他们除在军事上联盟抗曹外,在政治上则抨击曹操“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11]1261},“欲废汉自立久矣”^{[11]1262}。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曹操发布了这篇令文,借退还皇帝加封三县之名,试图表明他的本志,反击朝野谤议。文中概述了曹操统一中国北部的过程,曹操作为杰出军事家的形象在他逐个击破、平定天下、恢复统一的记载中跃然纸上,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昭然若揭。与他的诗歌风格一致,这篇自传文行文看去坦白直率,气势磅礴,充满豪气,虽则背后隐藏了真实的政治野心,但其中表现出的卓越政治家的气度、见识,以及劳苦功高、当仁不让的霸气形象,都体现了充满个性化特征的自传要素和文学风格。这篇文章作为自传的独特价值在于其独特的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完全吻合了后来西方对于自传基本要素的定义,如“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12]34};直抒胸臆,充满霸气的表达方式,充满鲜明的个性特征,如“性不信天命”^{[12]34},处处洋溢着王者之风,是研究曹操生平的重要文献资料。尽管它并非题为“自叙”、“自纪”等带有明显自传标签的自传作品,但从其内容判断,可以定位为自传作品。且作为自传,它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不再是书籍的附庸,而是作为彰显传主生平经历和政治抱负的单一功能的自传文,且突破了纯文人式自传的书写风格和模式。

总体而言,尽管发轫期的中国自传文学,普遍作为书籍的附庸存在于书的序言中,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仅作为叙述书籍写作原委的一部分的状态,“自我”并非其要烘托的重心,书的内容和立意才是。但其最大成就,一是规范了自传书写的基本模式——家世背景、出生时地、求学经历、仕宦之途。二是借助史书的修撰,史官本人和其他历史名人的自传分别以序和传的形式进入正史,成为史书中光

彩夺目的组成部分,与之一起不朽。凭藉史书万众瞩目的宏大影响与史官卓绝万代的才华的精彩联谊,中国的自传文学在汉代可谓一步跨过了通常新事物诞生之初寂寂无名、尚显稚嫩的萌芽期,直接到达了令后世景仰的高标境界。

三 中国自传文学的渐进期——魏晋南北朝

魏晋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人的觉醒”的时代,“魏晋风骨”这一说法也因此定型,成为时代精神的写照。名士风度影响下的魏晋时期的自传文学具有了更强的文学意味,在前代司马迁、扬雄等人的震撼人心的笔触之外,在开发自传谋篇立意的形式上,和深化自传的文学性上,都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新探索。有别于前人大篇幅的对于家族历史、人物生平的实录,魏晋的自传作者在时代风气、文化氛围和个人旨趣的影响下,逐渐将前人甚重的对于自身来历的记载,进行了刻意的省略,淡化了作为真实个人的基本要素,而将标举个人追求的人格境界和超凡志趣作为自传叙述的重心,在自传中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的隐逸孤高的名士形象,使之成为自身精神追求和人格理想的写照。代表人物有曹丕、葛洪、陶渊明等。如果说作为日后君王的曹丕的自传中还有对于出身来历和天赋英才的身份自豪感,那么葛洪则是以抑写扬、明贬实褒的方式来书写自己的人格追求。陶渊明则更是独辟一境,将自传直接引入虚构式玄幻化的新境界,使之成为真正的纯文学作品,对后世影响巨大,遂为虚构式自传的滥觞。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自传文学的渐进期,魏朝“三曹”之一、曹操之子曹丕(187年—226年)在登基之前也写有《典论·自叙》这篇自传,由于曹操的帝王身份是死后追封,所以,曹丕的《典论·自叙》才应该被视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帝王亲自书写自传现象的肇始。

在《典论·自叙》中,与其父一样,曹丕带着同样的王者风范,以第一人称展开了叙述,开篇即描写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形势,点明自身成长环境,接着分述了自己在骑射、剑术、铸盾和文学方面的综合能力,将自己描写成为一位文武双全、雄才大略的青年才俊形象:

尝与平虏将军刘勋、奋威将军邓展等共饮,闻展善有手臂,晓五兵,又称其能空手入白刃。余与论剑良久,谓言:“将军法非也,余顾尝好之,又得善术。”因求与余对。时酒酣耳热,方食芋蔗,便以为杖,下殿数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为之。余言:“吾法急属,难相中面,故齐臂耳。”展言:

“愿复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伪深进,展果寻前,余却脚剗,正截其颞,坐中惊视。余还坐,笑曰:“昔阳庆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术。今余亦愿邓将军捐弃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尽欢。^{[12]42-43}。

曹丕这篇自传的创新价值在于,他在其中加入了春秋笔法的场景化的文学描写,行文生动,妙趣横生。这一点在与邓展的两次比剑均凭自己出色的文韬武略胜出的描写中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示,刀圣邓展,精通各种武器,尤其以刀见长。官拜奋威将军,在官渡之战时作为曹操的贴身护卫。完胜当时的刀圣邓展,这样的表现手法,无疑将曹丕本人的武略抬高到一个在当时无以复加的地位。除了在自传中展示自己的天赋英才之外,文中描述了两度交手的过程和双方对话,细致刻画了两人心理和旁观者的反应,并以赛后与邓展的握手言欢,展现了帝王式的豪迈气概。有研究者认为:“强调自己是曹操唯一的合格继承人,这才是文章真正的主旨。”^{[3]33}这种推断不无道理。可以说,文学性手法的大幅加重,是曹丕对于自传文学发展最大的贡献,积极促进了当时对于自传文学性的开发,是中国自传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卓越贡献的人物。对于自传作为独立的文学类型存在,又向前推动了一步。

与曹丕以王者风范充分展示自身天赋英才的笔法完全背道而驰,晋代的自传作品,在名士之风的兴起、道家思想为中心的价值观念等多重社会文化元素的作用下,呈现出消极避世,自得其乐的思想倾向。晋朝著名的自传作品代表,葛洪和陶渊明的自传中皆表现出这种倾向。而且,葛洪和陶渊明的自传中都是以第三人称指代自己,只是一实一虚的区别而已。据川合康三先生的研究:“西欧自传能称其为自传,据路逊努(Philippe Lejeune)的说法,第一人称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中国则不然。尽管明明写的是自己,在人称上却和第三人称没有区别。”^{[3]23}以第三人称指代自己,在中国古文中司空见惯,以第三人称书写自传的传统,也贯穿着整个中国自传文学的发展历程。因为用了第三人称,使原是由其本人书写的自传,获得了似与自我拉开一段距离来审视的冷静、客观、克制的叙事效果。

东晋(317年—420年)的葛洪(284年—364年或343年)在其传世之作《抱朴子》外篇第五十的《自叙》中,以曲笔以自贬的方式,展示了自身的特立独行和异于众人的精神追求。

年十六,始读《教经》、《论语》、《诗》、《易》。贫乏无以远寻师友,孤陋寡闻,明浅思短,大义多

所不通。但贪广览,于众书乃无不暗诵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杂文章,近万卷。既性暗善忘,又少文,意志不专,所识者甚薄,亦不免惑。而著述时犹得有所引用,竟不成纯儒,不中为传授之师。其河洛图纬,一视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书、及算术、九宫、三基、太一、飞符之属,了不从焉,由其苦人而少气味也^{[13]340}。

洪之为人也,(有脱文)而骏野,性钝口讷,形貌丑陋,而终不辩自矜饰也。冠履垢弊,衣或缁缕,而或不耻焉。俗之服用,俾而屡改。或忽广领而大带,或促身而修袖,或长裾曳地,或短不蔽脚。洪期于守常,不随世变,言则率实,杜绝嘲戏,不得其人,终日默然。故邦人咸称之为抱朴之士,是以洪著书,因以自号焉^{[13]340-341}。

文中杂用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但第一人称仅出现在与他人比较凸显自身特异性时,文章主要还是以第三人称为主。川合康三先生认为,在《自叙》中“葛洪弱者的自我定位,就不是外在因素要求的结果,而是他试图通过宣称自己劣于众人的退让,进而确认自己异于众人的存在。”^{[3]42}“这种有意置身于社会基准之外、甘心于不可救药的自我定位,在此之前还没有出现过。”^{[3]35}从而葛洪的这篇自传就成为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在文人心灵世界的一种反射,成为自传文学在时代氛围影响下出现的一种新的自我定位的叙述方式和价值取向。而这种正话反说的叙事方式,却由此出现在了晋代的自传作品中。

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的著名诗人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的问世,则开启了自传文学的又一个崭新篇章。陶渊明出生于一个衰落的世家,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父亲早死,家贫,年轻时曾有“大济苍生”的抱负,曾做过几年的参军、祭酒的小官,但因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异常激烈,官场腐败黑暗,在门阀制度下,如陶渊明出身寒门庶族者很难得到重用,《晋书·陶潜传》中记载他曾发下“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14]的豪言壮语,加之其人性格“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序》),不愿“以心为形役”(陶渊明:《归去来辞》),终在任彭泽令时毅然解绶去职,弃官归田,过起了躬耕自足的田园生活。陶渊明的诗和辞赋散文在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造诣,开田园诗一体,为古典诗歌开辟了新的境界,平淡自然、直白如田家语的风格,极大地影响了后世诗歌的创作。遂成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诗品·卷中·宋徵士陶潜》)^[15]。而陶渊明这篇通过对五柳先

生这一假想人物的描述来用以自况的《五柳先生传》亦是他的传世代表作之一。萧统的《陶渊明传》和沈约的《宋书》中都认为是陶渊明本人的“自况”和“实录”,可见本文是作者自抒志趣的文章。文中描绘了一个爱好读书、不慕荣利、安贫乐道、忘怀得失的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形象,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7亦言:“渊明以彭泽令辞归,刘裕移晋,耻不复仕,号五柳先生。此传乃自述其生平之行也,潇潇澹逸,一片神行之文。”^[16]王瑶先生以为此文作于太元十七年(392年)陶渊明为江州祭酒以前,逯钦立先生则以为作于刘宋永初元年(420年)前后。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17]

这种虚构式自传的登场,是自传作为独立的文学类型登场的标志。以虚构人物来曲折地作为“自画像”抒己之志,是自庄子书中遗留下来的传统——将人物设定为超越现实的存在。而《五柳先生传》中的人物其姓名、籍贯无从知晓,这种语焉不详,恰是暗喻人物有超越现实的品格。五柳先生淡泊名利,超逸脱世,自由无碍的生活状态,正是陶渊明的人格理想和生活状态的双重写照。而“五柳”在之后也成为隐士的代称。因而《五柳先生传》也成为古往今来中国自传文学的代表之作。因其沿老庄之传,以虚写实的手法,所以《五柳先生传》也可视为是中国历史上自传完成由史到文过渡的标志性作品,由此确立了自传领域的一种独树一帜的书写模式。在陶渊明之后,这种虚构式的自传书写模式逐渐广受推崇,终至蔚为大观。川合康三先生曾指出:“五柳先生型的自传与西欧近代自传的不同点,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如篇幅的长短,作者、叙述者、登场人物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人生经历的回首怅望、还是人生理想的憧憬向往,等等),但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其自我认识的方法,不是面对自己的灵魂,自我审视,自我拷问,而是把自己放开,使之置身于共同体中,从而塑造出一个共有的人物形象。”^{[3]114}

在陶渊明之后,南朝著名文学家江淹的自传也

是传世之作。江淹出生于南朝宋,年少时即因文章而声名显著,一生为官历南朝宋、齐、梁三朝。江淹的《自序传》是其《江文通集》前集的序言,仍是作为书籍的序言存在,但江淹在这篇序言里明示了自己对于道家学说的偏好,可见当时整体文化氛围对其的影响。因该文较重实录,并符合自司马迁已定下的自传应有的几大要素,虽作为自传在体例上并无太多创新,但因之出色的文采,也成为了自传文学中的明珠。

作为中国自传文学的渐进期和形成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传在时代整体文化的综合影响下,呈现出日渐摆脱作为史书附庸的地位,而向纯文学靠近的趋势,文学手法的高超运用诉之于自传,令自传绽放出文学的华彩,为其作为独立文学类型进一步走向繁荣完成了至关重要的推进。文学巨匠的创造性开发,新的书写模式的确立,是这一时期的突出表征,为“自传”在唐代作为独立的文学形式的正名和确立,以及自传文学在唐代臻于鼎盛,开创新纪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 结语

先秦至魏晋作为中国自传文学传统的形成期,无论是最初的由史入文,还是后来的虚构式自传,从文体的发生、写作方式、自我意识等诸多方面的探索都贡献巨大,令自传中文人的自我呈现展示出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深远的开拓空间,彪炳千秋的文人巨匠的创造性笔法和震烁古今的宏大成就,更令这一时期的自传文学佳作不断,风格多变,高潮迭起,为中国自传文学日后蔚为大观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自传的形成期之后,在唐代迎来了其辉煌期,“自传”一词在盛唐末期的生成(陆羽的《陆文学自传》的诞生),标志着自传作为独立文学类型的正式确立,并出现了从序、传、墓志铭(前代未有的自撰墓志铭)到说、状、书等几乎全部的中国古代自传的文体类型,除了清代的“忆语体”小说(以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为滥觞,以沈复的《浮生六记》为代表),可以说是众体皆备,作品众多,影响深远。不仅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将自传的文学性发挥到了极致,而且在自传的表现内容上更是精彩纷呈,令人叹为观止,较之前代自传有了跨越性的发展。可以说,如果没有先秦至魏晋对于中国自传文学传统的确立和创造性的探索,唐代自传文学井喷式发展的壮观景象是无从发生的。

综上所述,先秦至魏晋的自传文学的发生发展,将自传塑造成为文人自我对于个体命运和文化选择的言说方式,集体无意识的时代氛围和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三者交相辉映,从而迸发出层峦叠嶂的效果的复合型文本。这些带着脉搏和体温的文字,为考察几千年前的历史史实和民族思维方式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在文学性之上,更是具有多重价值的经典文本。自传本身作为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描述的特质与传主特异的人生经历相黏合,加上自传书写目的的不一而足,更加促成了自传各具特色的摇曳多姿的文化景观。将中国自传文学的发展放置于先秦至魏晋这一阶段来考察,尤其能深刻地探知中国自传文学传统的形成,文人自我呈现方式的流变,从而看到中国自传文学的原初形态和渐进式的发展脉络,以及日后蔚为大观的文化成因,是不容忽视的历史阶段,值得深入探究。

[参考文献]

- [1] Robert Folkenfic. The Culture of Autobiography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2] [日] 中川久定. 自传文学 [M]. 东京: 岩波新书, 1979: 4.
- [3] [日] 川合康三. 中国的自传文学 [M]. 蔡毅,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 [4] 郭沫若. 郭沫若全集: 第 11 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7.
- [5] 司马迁. 史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6] 班固. 汉书 [M]. 颜师古,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2725.
- [7] 左丘明. 春秋左传注 [M]. 杨伯峻, 编.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1088.
- [8] 司马迁. 报任少卿书 [M] // 名家精译《古文观止》.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199.
- [9] 金开诚, 董洪利, 高路明. 屈原集校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758.
- [10] 黄晖. 《论衡》校释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1190.
- [11] 陈寿. 三国志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12] 周启成. 古代文人自传精华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 [13] 王明. 《抱朴子内篇》校释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14] 房玄龄, 等. 晋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2461.
- [15] 何文焕, 辑. 历代诗话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13.
- [16] 黄坤, 刘永翔, 编. 中华古文观止 [M]. 北京: 学林出版社, 1995: 406.
- [17] 龚斌. 陶渊明集校笺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444-445.